1. 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即集体性的记忆，记忆是离不开他人和社会的参与的，所有的记忆都是从目前出发，受目前社会系统的形塑，对过去的重构。

（集体记忆是目前持续的思想；集体记忆保存传统；集体记忆对过去一般没有明确清晰的时间，它总是在保持过去与目前的相似性中延续，在目前的社会框架和认识中对过去进行重构；）

2. 亨利 柏格森

法国哲学家，现代西方记忆理论的奠基人，他的核心概念是“绵延”，意即在人的意识中，过 去、现在与未来不可分割地连结起来，形成意识的绵延不绝。绵延并非混浊无物，知觉和记忆构成其内容，但“‘纯粹的’自发的知觉其实只是一种理想，一种极致。每一个知觉都填充着一定深度的绵延，都将过去延伸到当前之中，同时也由此成了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绵延即记忆，记忆（含瞬间知觉）构成人对世界的认知和精神世界。

3. 埃米尔 涂尔干

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提出了“社会事实” 概念，即人的“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他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从外部社会事实中寻求对人类行为做出解释，并明确反对从人的主观心理来解释人的行为。

4. 莫里斯 哈布瓦赫

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集体记忆”的理论，认为所有记忆都受到集体、社会框架的影响和形塑。在“集体记忆”理论中，涂尔干的外部集体、社会框架的影响与形塑替代了柏格森的个人内在自由主义；而涂尔干由分析外部社会事实来研究人的行为活动则被转化为对人内在客观记忆结构的研究。换言之，哈布瓦赫成功地将涂尔干对人的外部客观性研究转化为对人的内部客观性研究，这一点得益于柏格森对记忆的精深分析。

5. “文化记忆”

最早由德国艺术家阿拜·瓦尔堡提出。后来扬·阿斯曼夫妇对这一概念予以充分阐述。他们明显受到耶茨的记忆术“图像”等文化标识储存绵延记忆的启发，“文化记忆”是“机构化的记忆术”。它以“文化科学为研究的对象”，与“交流记忆” 相对应，是指通过文化符号、文本、仪式和纪念性建筑等储存和传递的记忆。

这一理论的提出对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其问题也比较明显，一是存在着把一切文化泛化为记忆的倾向；二是尽管作为集体记忆理论的细化，“文化记忆”仍在文本和档案等方面与历史记忆纠缠不清，造成新的概念困扰。

6. 顾颉刚 疑古 历史文本批评学派

研究“典籍科学考据学”。其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在其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这充分体现在他对大量历史文本的进行的具体分析实践中，并体现在其贯彻史学理性主义的精神、态度和意志中。比其他同时代史学家更能坚持文本分析中心主义。他的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虽然是为了把握历史现实（重建古史），而其直接研究对象却是历史文本（典籍）。在历史文本分析方面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7. 符号学

研究社会人文科学各学科结构和功能以及彼此相互关系的研究，而对语义含混的文本之解剖，则为其主要的工作领域之一。

历史符号学：狭义符号学是指人类话语系统和其所指称的历史现实的相关关系分析，其特例即历史话语和历史现实的意指关系研究；广义符号学则指人文科学理论话语构成的普遍语义学分析。百年来现代符号学的发展，使其成为当代和未来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进一步朝向现代化发展的语义学工具之一。按照符号学观点，人文科学实践程序宜于划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是有关人文科学话语本身及其与社会现实之关系的语义学研究；其次才是有关社会现实本身、也即有关历史现实之因果关系和评价关系的研究（简言之，应区分话语对象和现实对象）。

8. 古史辨

顾颉刚的所谓古史辨学派的方向，本质上是一种“古典文本意义分析”的方向。其辨伪学的价值不在于史事的猜测本身，而在于借助此类猜测而组织起来的文本内在分析的成果：文本的性质分析和其形成的外部原因的猜测，可以相互分离。古史辨派的史学研究，在摧毁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在历史文本分析方面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9. 王国维 释古 二重证据法

从历史符号学角度看，所谓“二重证据法”显然不是一个严格科学性的概念。因为它简单化了两个不同学科（考古学和古史学）运作程序之间的关系问题。

王的重事主义：王代表的信史派以“建设”可靠史事为第一目标，

顾氏的重真主义：以顾氏为代表的疑史派，则以探得史籍话语真伪为第一目标。真伪，不是指对史事的直接验证，而是指对文本和史事对应关系的间接推证。求真派目的在于搞清历史文本“所言”究竟为何，以及所指涉的史事真确到什么程度。“求真”关心的是文本对其“所指”的意指关系本身，真假即指二者的相符关系程度。